

论人水和谐^①

陈阿江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可从两种理想类型入手探讨人水关系。在“人水不谐”型里,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呈恶性循环:水污染导致居民患病,影响经济发展,诱发贫困,随着污染危害的加深,出现人口迁移,进而加剧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次生社会问题。“人水和谐”型为人与水互动的良性循环,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发展生产,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保护环境提供了动力,也为社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重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特征及生态知识,是实现由“人水不谐”向“人水和谐”转型的认知前提。

关键词:人水和谐;人水不谐;污染;生态社区

中图分类号: C9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8)04-0019-06

一、引言

水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在工农业生产过程中水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传统社会里,除了面临旱灾之类的自然灾害,在人类生活的概念里,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用水量急剧增加。与此同时,水污染日益严重,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像太湖流域这样的富水地区也出现了所谓的“水质性”缺水,人类的不当活动造成并加剧了“水荒”。因为水污染而造成的疾病、贫困、人口迁移(生态移民)等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进而形成社会不平等次生社会问题。与此不同的是在经历了挫折和失败后,部分地区走出了“污染—疾病—贫困”这样的恶性循环,实现了生态保护、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多赢格局。因此,无论就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看,探究人水和谐关系已成为一项迫切的研究课题。

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比较集中的研讨是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视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提法主要是源

于当时(当前)社会运行与社会矛盾的一些新特点,即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调整、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进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如何协调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和谐相处的社会已成重要任务。

之后,关于和谐社会的含义、内容等,学术界开始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陆学艺从结构角度入手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指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对现有结构进行调整^[1]。郑杭生认为社会三大部门结构和功能的调整是和谐社会建设所必需,只有消除社会三大部门结构性、功能性障碍,才能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协调的社会结构^[2]。西方社会学事实上也一直关注“社会和谐”问题;社会均衡论从正面解读社会和谐问题,社会冲突论则从反面解读社会的“和谐”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和谐”一词最早出现于《管子·兵法》中:“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辑以悉,莫之能伤。”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才能协调,才能达到整体的步调一致。孔子所极力倡导的“仁”,实际上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问题,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则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老子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论述至今仍是国际社会

收稿日期 2008-09-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SH036)

作者简介 陈阿江(1963—)男,江苏吴江人,教授,博士,从事环境社会学、城乡社会学、项目社会评价等研究。

① 本文对课题组实地调查的若干地名作了技术处理,它们是浙北的兴城镇,苏南的大华镇与黄石水库,苏北和浙北受污染的东井村和西桥村,皖南的小坑村和兴村。

思考环境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思想遗产。

和谐社会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 :一是人与人的和谐 ;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人与自然的和谐 ,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的和谐。所以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的社会和谐。当然 ,这里所说的人是社会中的人 ,是社会人 ,即既是单独个人也包括群体和社会阶层。

为什么说现代社会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和谐 ,归根结底也是人与人的和谐问题呢 ?在前现代社会中 ,相对于人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与摄取能力来说 ,水资源无限多、水环境容量无限大 ,但这样的假设在现代社会已不能成立。所以 ,如何争取最大的资源、获得最大的环境容量是现代社会“ 理性人 ”所必须面对的。水资源短缺、排污纠纷以及环保运动等 ,水只是扮演这些“ 故事 ”的舞台 ,而人与人的竞争、合作、矛盾、冲突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人—水 ’和谐机制研究——基于太湖、淮河流域的农村实地调查 ”的主题文章 ,以理想类型为切入点 ,意在从宏观角度、一般层面探讨人—水关系。笔者认为 ,在目前阶段 ,探讨人水关系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从当前的资金投入和行动导向看 ,政府及相关部门都急于用技术去解决水污染问题 ,但正如当年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的问题不是“ 知易行难 ”而是“ 知难行易 ” ,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科学家进行耐心的调查、研究 ,解决基本的认知问题。所以本课题在设计时 ,在研究策略上不追求宏大、完美的研究 ,而是承认一个课题研究的局限性 ,在有限的能力、精力条件下作出有限而踏实可靠的研究^①。课题组在太湖流域和淮河流域研究发育比较完全的“ 人水和谐 ”和“ 人水不谐 ”类型 ,探讨“ 人水和谐 ”型社区的主要特征和形成机制 ,进而探索实现向“ 人水和谐 ”社区转型的条件、机制和内部规律性等问题。

二、环境衰退与疾病、贫困和迁移： “ 人水不谐 ”型

笔者 2005 年在太湖流域进行的实地调查中注意到地方干部和群众对因水污染造成的人体健康受损状况十分担忧 ,听到了诸如“ 癌症村 ”、“ 征兵体检没有一个合格的 ”等等的说法 ,引起了笔者对环境污

染与人体健康关系的关注^②。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水污染导致了疾病 ,影响了居民的身体健康 ,污染影响了经济发展 ,使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诱发贫困 ;污染危害到一定程度以后 ,出现受影响人口“ 逃离 ”现象 ,而人口迁移又加剧了社会分化 ,导致社会不平等次生社会问题。这样的社区可以概括为“ 环境衰退、疾病、贫困…… ”的“ 人水不谐 ”型 ,称 DDP 型(即英文字母 Degradation ,Disease ,Poverty... 的第一个字母构成) ,简称 D 点。

关于水污染与疾病的关系 ,日本的水俣病事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③。中国国内虽然还没有检索到完整的医学统计数据 ,但基本的事实是清楚的^④。如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沿岸 ,经媒体报道的“ 癌症村 ”不少于 10 个 ,而在基层工作的志愿者们发现的“ 癌症村 ”更多 ,如霍岱珊在沈丘一地就发现了 20 多个癌症发病超过 100 人的“ 癌症村 ”^{⑤⑥}。从媒体的报道看 ,沙颍河流经的河南沈丘县是个重灾区。如该县周营乡黄孟营村(总人口 2 140 人) 村委会主任王林生的调查统计表明 :1990 ~ 2004 年确定因癌症去世的村民达到 118 人 ,占总死因的 54% ,育龄夫妇中不孕不育患者超过一半 ;10 多年来没有一个人能通过征兵体检当上兵。在附近的赵古台自然村 ,总共 300 多口人 ,近几年竟生下 6 名先天性心脏病婴儿^{⑦⑧}。除沙颍河沿岸外 ,媒体报道的还有安徽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杨庄乡张庄村、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姚家湾、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仇岗村等。江苏阜宁古河镇洋桥村等^{⑨⑩} ,因为引进化工企业也成为癌症村。在太湖流域 ,见诸媒体的有江苏无锡市崇安区广益镇广丰村 ,浙江嘉兴双塔村、西雁村等等。

从实地调查结果看 ,污染导致的疾病与死亡事故的危害程度似乎与我们预想的有所差别。按照医学常识 ,污染应该与疾病呈正相关关系 ,即如果企业持续污染周围地区 ,那么受影响人群危害持续加重 ,健康问题持续恶化。这可以看做是污染—疾病/死亡关系的纯医学假设。我们在实际的研究中发现 ,疾病发病率、死亡率达到一定的峰值以后 ,即使污染持续 ,疾病发病率与死亡率也没有继续呈上升趋势 ,相反还有可能会降低(图 1)。笔者对课题组成员罗亚娟、程鹏立提供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东井村

① 这方面 ,日本环境社会学家的作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们脚踏实地地进行一个个案例研究 ,逐步积累 ,发展自己的概念和理论。

② 在本课题研究进行文献检索时发现 ,有关“ 癌症村 ”、“ 怪病村 ”的现象媒体已作了大量的报导。2008 年 7 月 9 日 ,用“ 癌症村 ”在 Google 进行检索时 ,网页显示 约有 69000 项符合“ 癌症村 ”的查询结果 。

③ 如果用下面的陈述“ 水污染导致受影响居民的疾病/死亡 ”来表达当前水污染的状况 ,虽然“ 医学事实 ”、“ 法学事实 ”可能还不甚清楚 ,但社会学事实已很清楚。

和西桥村是两个受污染严重而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奇高的地方,但癌症年死亡率大约达到1%时(一个100人的村庄1年因为癌症而死亡的大约1人这个比例时),比例就不再提高。笔者的初步假设是:如果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是潜在的,那么普通人是不容易发现的,但是,一旦某些疾病发病或死亡现象出现特别的异常,那么村民就会探讨因果关系,或者虽然无法获得明确的因果关系,但可以采取提高“安全系数”的办法,从而使患病或死亡的情况在到达一定的峰值以后,不再提高。通过人的“避害”选择,无疑阻止了污染对受影响人类健康的进一步危害。这是对污染与疾病的纯医学模式的修正,可以看做是污染—疾病/死亡关系的社会学假设。显然社会学的“污染—疾病/死亡关系”模型注意到了人在污染、疾病、死亡过程中的避害、能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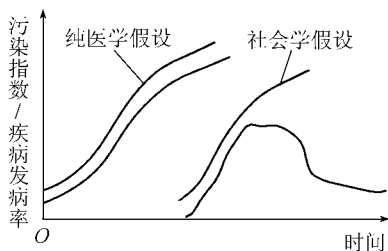


图1 污染与疾病发病率关系的假设

从“污染—疾病/死亡关系”社会学假设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人的积极的避害行动,使污染对人体的持续危害大大减轻了。但从更长的时段看,这样的情况潜伏更大的危害。虽然因为人的“避害”减少了疾病,但却让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持续地非法排污。如果企业污染与居民疾病/死亡是线性正相关的,即使合乎“纯医学模式”的话(像企业的设备出现故障而使操作工的身体出现伤残),政府、公众对问题的认识一目了然,对问题的处理也会准确、及时。但由于污染—疾病/死亡符合社会学模式,即人们对污染危害程度的认识比实际的可能要轻,以至于企业、政府及公众产生“污染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这样的错觉,也增加了“污染—疾病/死亡”因果关系确定的社会认知困难。

“人水不谐”型社区里,除了污染影响居民健康,也已经导致了部分社会阶层的贫困化问题。

工业企业未经处理、或者处理而没有达标排污的,水产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太湖流域有很多的天然水域,天然捕捞业曾经是一项重要的产业,但现在由于大部分水域受到污染,天然捕捞的产量微乎其微,有些水域虽能捕一些鱼,却因有异味居民不敢

吃。水污染对水产养殖业的危害更加明显。单次的污染,就会使养殖户蒙受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如浙江嘉兴北部水域连年遭受上游污染侵害,对渔业资源造成重大灾害。仅2001年一次严重的水污染就导致嘉兴市养殖户300万只珍珠蚌死亡,200万只珍珠蚌被迫转移,666.7 hm²水面荒废^[6]。长期的水污染,后果更加严重。鱼类资源几乎损失殆尽。随着污染的步步逼近,产业被迫后撤。在嘉兴北部地区,由于遭受污染,外荡养鱼被迫放弃而改养耐污力比较强的珍珠蚌,在一些水质没有确保的内荡,也被迫放弃养殖鱼虾。水产业正濒于毁灭性的边缘。

“6·27事件”^①发生后,兴城镇一些靠天然捕捞为业的渔民就面临失业的危险。兴城镇的天然水面面积有600 hm²多,有2个渔民村,村民主要靠捕捞为生。因为水污染爆发,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要靠政府救助(2005年7月12日对兴城镇农业服务中心P先生的访谈)。但贫困与污染的相关不是一种线性表达,主要是因为受影响人通过迁移选择,包括人口的直接迁移、职业选择、特别是代际职业选择,部分抵消了污染的直接影响。但这并不能掩盖水产业毁灭性影响的基本事实。

除了水产业,其他行业也会因为污染而导致经济萧条、地区贫困问题。淮河流域的丁集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990年前后,丁集曾是中原地区的皮革加工集散地,是全国乡镇“百强”之一。后因污染过重,环保部门查处、媒体曝光,居民也因为担心健康而搬迁,于是丁集逐渐衰微。据偶正涛的观察:

镇上人员稀少,虽是艳阳高照的中午,也感到萧条凄凉,不像人们传说那样红火。……向王兆华说,这里原来家家有厂子,户户搞皮革。全国的商人都来采购。现在污染得水没有人敢喝,外地人不敢来。镇上有办法的人都搬走了,留下的人要么实在没有办法,要么还在这里办厂子。现在办厂子的人也不多了^[7]。

疾病往往是致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中国农村地区贫困人群中,由于疾病导致贫困的,或者虽然脱了贫但因为疾病而又返贫的,占了相当高的比例。污染而导致疾病,因疾病而继发生性贫困,这样的恶性循环的在污染严重的地区普遍存在。另外一个极端的情况是,村民因污染而进行抗争,长期的上访、没完没了的官司,影响了村民正常的生活、生产。东井村的调查发现,村民为了进行污染抗争而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8]。

但是另一方面,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会因环境

① 参见:吴明明.京杭运河L塘水质突变威胁50万人饮水安全[N].现代快报,2005-07-01.

的变化而进行积极的应对活动,以削弱环境对他的负面影响。从排污者(在多数情况下,他也往往是污染的受害者)方面看,他发现污染以及因为污染产生的负面影响,通过学习、思考,采取新的发展策略,探寻生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多赢格局。遗憾的是,目前进行积极思考、努力探索并且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多赢”类型并不多。从环境污染的被动受影响方看,他们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选择与企业进行抗争,抵制企业的污染。从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看,与污染进行抗争的人有,但最终能够取得成效的可谓寥寥无几。另外一个办法是选择沉默、或经过抗争无效后选择沉默,这是目前中国环境受害人大多数实际采取的策略^[9-10]。在普通的污染情形下,他们选择忍受,而像所谓的“癌症村”这样的类型,有条件的部分居民开始“逃离”。有经济实力的人,通过在城镇购买住房,逃离原来的居住地。另有一些人,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地方上学以逃避本地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还有一些人则选择长期在外打工,虽然户籍上没有迁出,但实际上已经很少回家居住,以减少环境污染可能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在应对环境污染方面,由于不同阶层的信息获得能力、认知水平、受教育程度、经济承受能力等等方面存在差别,次生社会问题——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因此产生。

显然,“人水不谐”型是因为污染而导致疾病、贫困、迁移、社会不平等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模式。人类应当避免这样的类型,探寻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类型。

三、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人水和谐”型

与前述的因为污染而导致的疾病、贫困、迁移、社会不平等这一理想类型的进路相反,另外一种理想类型是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或者称 EES 型(Ecologic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简称 E 点。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强调天人关系的和谐(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在中国文人的山水画中,高山流水、枕溪的小屋、人们乐于其中的构图到处可见。构图所传达的观念显而易见:人是自然中极其微小的分子,而不是自然的主宰。在民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也发展和积累了大量的人水和谐相处的物质文化和规范文化。比如笔者研究的太湖流域的圩田系统,水域—水田—旱地构成一个循环有序的物质系统,在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各个环节中,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只是整个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实践中发育的生态伦理与实践规范约束人的行动,使

之符合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系统的要求,维护圩田系统的正常运行^[11]。简而言之,在快速工业化到来之前,生态环境普遍是比较好的。但传统社会中物质的极度匮乏、经济的长期低效状况,也恰恰是现代中国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山清水秀”在很大程度上是“贫困”的代名词。当今天的城市和东部地区衣食住行得到极大改善的情况下,我们深入到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地区时,仍然会感慨于环境很好但人很穷的窘境。

因此,衡量一个社会、一个社区,必须从多方面综合考虑。1999 年笔者受亚洲开发银行委托就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项目在重庆、四川、云南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田野工作。通过与地方官员、技术行家、乡村精英及普通百姓的广泛讨论,笔者发现,即使像水土保持这样的项目,人们对经济的考虑也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无论是封山育林、植水保林或种经济果木,如果没有持续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很难得以持续,所以即使是这样的以生态、公益为目标的水保项目,仍然需要考虑项目各利益群体在项目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必须统筹考虑。工业化及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推进,使当前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看重经济,经济理性普及程度高于历史上任何时期。因此,小至个人的活动、家庭决策,大至企业建设、政府项目,无论做什么,经济利益始终是决策的焦点。对生态问题的思考、环境治理策略的设计,自然不能割裂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去理解社会^[12]。

生态/环境项目必须考虑其经济效益,否则难以持续;与此同时,任何经济活动,也应有生态的和社会的考虑,否则难以持续,D 型社区就是因为只考虑经济的增长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典型案例。关于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必然会影响到甚至牺牲环境,如果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必然会降低经济效益。假如这样的关系是一个“铁律”,那么作为经济理性人的企业主进行经济活动时就不会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但事实上,生态与经济两个因子并不总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互为增益的情形也是大量存在的,只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或者为“短期理性”所蒙蔽。正是因为社会有这样的“普遍共识”,“生态—经济—社会多赢”型显得凤毛麟角,解剖分析这样的类型显得弥足珍贵。

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笔者发现,这样的类型又有不同的亚类:一类是无意识的生态经济,即借助于良好的生态环境,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小坑的茶叶——至少就生产者方面看——就具备这一类型的

特点。小坑村相对而言是属于人少地广、山多林深的地方。林多、土壤的腐殖质多,茶叶味好,且耐泡,受到附近特别是城市消费者欢迎,名气也慢慢大了。甚至,深山中的溪水“小坑”水也直接销售到城市。但我们在小坑村对农户进行观察和访问时发现,普通农户虽然已经意识到山外的人因为知道山里的环境好而进山购买茶叶,却还没有积极主动的生态意识。我们注意到,林间大量地种植茶叶,甚至把一些坡上的原生林、次生林砍掉开荒植茶。2007年大水后,水土流失比较严重。从长远看,小坑茶叶因良好的生态环境而生财,但因为缺乏长远的考虑和自觉的生态意识,很可能会使环境承受更大的压力。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并不少见。

另一类是在盲目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因为破坏了生态环境而遭到自然界的“报复”,然后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路径,探索生态经济发展的道路。课题组另外一个点兴村,其养蟹方式的转变是在实践中认识生态、探索生态知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河蟹养殖经历了从自然养殖、掠夺式的短视养殖到有意识地生态养殖(当地总结为“大养蟹”到“养大蟹”)的生态经济转型。在“只蟹克金”的利益驱动下,199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所有养殖户都进行高密度投放蟹苗,投放密度比正常高出2倍甚至4倍。与此同时,养殖户完全忽略了螃蟹所依赖的生态环境,以至于既是螃蟹食物又具有调节水环境的水草和螺蛳等水生动植物被消耗殆尽。水质由原来的Ⅱ类和Ⅲ类恶化为Ⅳ类和Ⅴ类。恶化的水环境增加了河蟹的疾病和死亡率,养殖成本提高,而河蟹的规格下降、质量下降,加上市场变化等原因,利润下滑。到1990年代后期,经济效益下降,多数养殖户没有收益,有的甚至负债。痛定思痛,一些有心人开始思考和探索新的养殖方式,并在实践中摸索了“种草、投螺、稀放、配养”的生态养殖模式。随即河蟹生长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虽然河蟹产量下降,但河蟹的品质得到提升,市场竞争力增强,效益提高。区域水质也恢复到Ⅱ类、Ⅲ类。课题组成员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居民在河里淘米洗菜。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村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也随即提高。如兴村,村集体有220万元的河面承包费收入,年终根据土地和人口给本村村民分红。村集体医疗也有了起色,对符合并愿意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村民,村集体经济支付30%的份额。此外,还为老年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丰富老年人的生活,等等^[13-14]。

兴村螃蟹养殖方式的转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学习、了解生态系统以及合乎生态生

产的基本知识,探索生态经济的路子,使水生态环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协调。

四、结论:从“人水不谐”到“人水和谐”的转型

现实生活中的社区(社会)大多介于“人水不谐”和“人水和谐”两个理想类型之间。如果能够消除或减少“人水不谐”型社区,推动“人水和谐”型社区的增长,或者,消除社区中“人水不谐”的因子,增进“人水和谐”因子,那么人水和谐的社会建设就向前进了一步。所以关键是怎样改变因为经济增长而污染环境的问题,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多赢的格局。前述兴村的案例表明,水环境既可以致水产业于死地,也可以和经济协调,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2008年4月课题组在大华镇黄石库区的调查也显示,工业污染的治理远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么困难。首先,污染的处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当黄石水库被市政府列为水源地而环境保护政策从紧以后,企业被迫约束了自己的行为。比如油漆生产企业原来露天堆放的原料,现在不得不建起了遮雨棚,以免下雨使粘在容器上、及容器周围的化工品随雨水流入河道,造成污染。政策从紧后,冲刷地面的洗涤水也必须进入污染处理系统。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事几乎每个企业都能够做,但大部分企业原来都不做。其次,在多数情况下,污染的处理技术是成熟的,如果需要提高现有的技术,或寻求新的技术,通过市场完全可以解决。我们访问的一家企业用10万元委托一所地方高校解决他们所需要的污染处理技术。再次,关于污染处理的成本问题。几乎所有企业总是抱怨污染处理成本高,但实际上成本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高。上述说的阻断容器污染雨水外流及购买高校技术的案例,所提高的成本,企业完全可以承受。最后,企业实际的转型能力也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大华镇的一位企业主比较了政策从紧后企业转产与不转产的利弊得失。她说,如果现在不转产,企业还可以生产几年。但如果及早转产,虽然转产会面临大量的直接经济损失,如应收款收不到的问题,但却意味着及早抢占了市场先机,所以权衡之后,他们最后选择稳妥转产的方案,而不是死守原来的产业。关于转型的进一步研究笔者将用另文专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工业污染的问题关键是企业想不想做、肯不肯动脑筋做,地方政府是想“从紧”还是想“宽松”?这取决于政府、企业是否有足够的认知能力。

所以对环境问题还需要在一个比较宏观的层面和较长时段去看,其中,对目前的社会特征能否作出

准确估计和判断是非常关键的。

首先,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看,我们对增长中的现代性,特别是现代性中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到现代社会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地球村”已经变得十分脆弱,充满风险。在前现代社会,人仅仅是自然中的一分子、整个生态链中的一个环节,人虽有战胜自然的理想和愿望,但实际上人力在自然界面前显得很渺小,各种各样的自然神、自然崇拜流行于各类前现代社会中就是明证。但在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改变,以人类为一方,以人类以外的自然界为另一方,构成了真实的对抗;“人定胜天”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总爆炸当量约相当于130亿t TNT的全球数万件核武器,其威力至少可以摧毁地球50次。“人水”关系的格局同样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一家小化工厂的排污可以在一夜之间污染一条河流,使该流域的生物死亡乃至绝迹。就区域而言,因快速工业化而产生的污染物正在超越水体的承载力。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太湖流域到2005年的GDP总量大约是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的50倍,而增长最快的苏州市则达到100倍^①。在没有或较少进行污水处理的情况下,污染总量也呈快速增长,所产生的污染很快地使流域的水体达到饱和。即使能够按照目前的标准处理后达标排放,也仍然存在环境容量不足的问题。

其次,人们对生态知识的认识有限,对生态知识的特殊性知之更少。我们时代的生态悲剧,不仅仅因为我们知道得少,而发生了那么多的污染故事,更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生态知识很少而自以为是。小至生态村建设,大至生态县、生态市甚至生态省建设,大凡具备一点生态常识的人看到那些高高飘扬的生态标语,就会明白那些做法实际上连最起码的生态常识都不具备。

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与现代的单科知识、单项技术有较大差别,人类对于生态知识这一系统知识的认知比对单科知识的认知更为困难。在前现代社会里,村民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了许多生态经济类型,如太湖流域的“圩田制”即是生态经济类型,与此同时,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发展和实践了生态伦理规则,约束了人的行为,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随着工业化的加快,不仅原有构成的人力与自然力的平衡被打破,原有的规则也失去效力。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显然还没有像对物理学知识、化学知识、电脑技术的了解那样了解关系复杂、影响效果滞

后的生态系统知识。西方人的认知也有相似的特点,半个世纪前,卡森对美国农药使用的研究说明,当时那些掌握了“高科技”的人对于生态学知识也十分缺乏^[15]。当前中国社会缺乏生态学知识的现象,不仅表现在低文化群体中,也广泛存在于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精英人物中。农民超剂量、超范围使用农药,自然归因于农民的文化程度低,但滥用抗菌素的现象广泛存在于高文化教育人群中,这说明人类对生态系统知识的认知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 [1] 陆学艺.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结构的调整[J].江苏社会科学,2006(6):1-5.
- [2] 郑杭生.社会三大部门协调与和谐社会建设:一种社会学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1):27-29.
- [3] 程鹏立.日本“水俣病”的社会学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0(4):30-33.
- [4] 殷俊.淮河流域的几十个“癌症村”[J].乡镇论坛,2007(8):22.
- [5] 叶文添.江苏盐城癌症村化工污染调查夺命GDP的背后[J].乡镇论坛,2006(5):40-41.
- [6] 童剑华.300万只珍珠蚌枉死污水 苏嘉运河污染严重[N].人民日报,2001-11-09(2).
- [7] 偶正涛.暗访淮河[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21-122.
- [8] 罗亚娟.环境社会学视角下的环境污染问题:东井村个案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0(4):34-37.
- [9] 陈阿江.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J].浙江学刊,2006(4):169-175.
- [10] 冯仕政.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122-132.
- [11] 陈阿江.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东村个案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62-69.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82.
- [13] 陈涛.生态现代化视角下皖南农村发展的实证研究:兼论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J].现代经济探讨,2008(7):37-41.
- [14] 陈涛.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环境社会学分析——兴村个案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0(4):25-29.
- [15] 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① 笔者在上“环境社会学”课时给研究生做过一个关于倍数变化的演示:1滴蓝黑墨水滴入一杯清水中,水还是清的;2滴、3滴……还是清的;5滴后开始有点色感;10滴就感觉到水中有色……20滴、30滴就很明显;滴入100滴,水杯就像盛了墨水一般。